



浅谈明代白银与铜钱的比价问题



严 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

明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通过这 276 年的经济发展,在货币流通方面完成了从贱金属铸币向贵金属货币转换的过程,确立了银本位制度;同时在宋元海外贸易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海外贸易的领域,开始进行一定规模的海外经济交流,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带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银匠制度”。因此,在现代学术界,明代经济史的发展是史学研究所关注的重点。

在研究明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笔者对明代货币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发现白银和铜钱的比价变动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以及生产力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尝试通过对白银和铜钱的比价分析来解析明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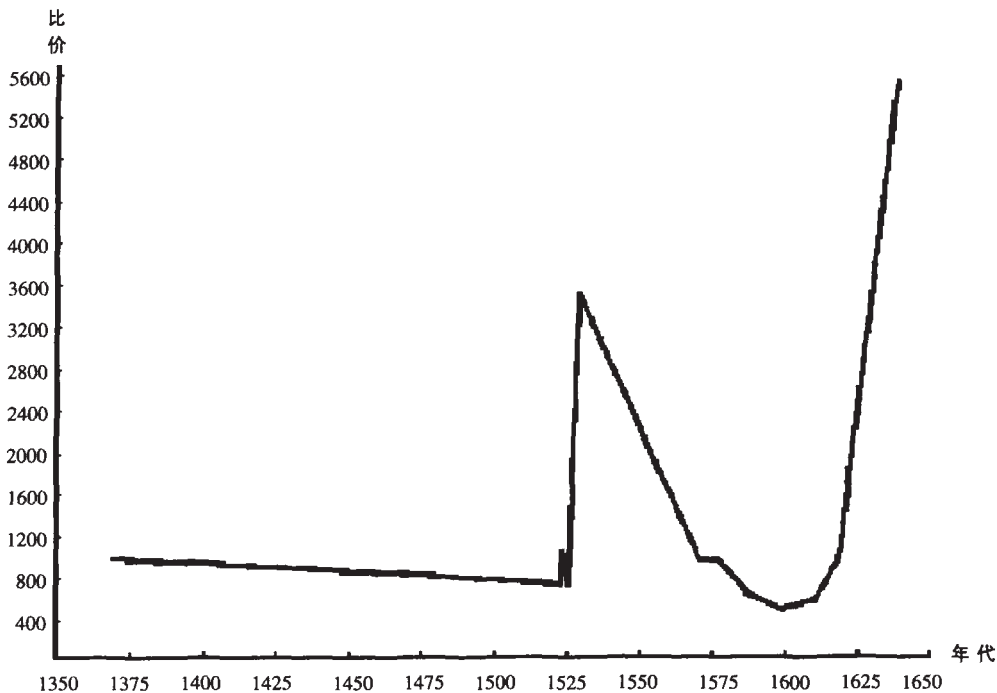
一、明代银钱比价的变动情况

白银在明代货币体系中作为主币,铜钱作为辅币,在明代纷杂的货币制度下,白银与铜钱的比价经历了上涨、下跌,以至最后阶段的通货膨胀。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明代白银与铜钱比价的变动过程。

明初,明朝政府实行的是严格的宝钞制度,同时流通铜钱,《续修四库全书》中记载“曰户部准奏,印造大明宝钞与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此外,政府还禁止使用白银。但是,从宋代就已经开始大量使用白银的趋势无法被一纸政令所中止,从史料中仍可以看到白银在流通领域使用的记载。《续修四库全书》中明确规定“每钞 1 贯折铜钱一千文银一两”。到了成化年间,史料记载:“成化十七年……每钱八文折银一分,八十文折银一钱”^①。《明史》其后记载“弘治元年每七百当银一两”^②、“每钱七文折银一分”^③。到了正德年间(1506~1521 年),“每七百文折银一分”^④。嘉靖时期记载“嘉靖三年……好钱每银一钱七文,低钱每银一钱一百四十文”^⑤。到嘉靖四年(1525

年),“令宣课分司收税每钞一贯折银 3 厘,每钱 7 文折银一分”^⑥。到嘉靖六年(1527 年),“每钱 700 文准银一两”^⑦。但翻阅更多史料,才了解嘉靖时期貌似稳定的白银与制钱的比价实际上只是政府的规定,而此时的民间社会白银与制钱的比价则波动频繁。史料记载“民间行滥恶钱率以三四十钱当银一分,后益杂铅锡薄劣无形制以六七十文当银一分”^⑧,有官员也奏请“许民用小钱以六十文当银一分”^⑨。遇到自然灾害,流民“就食京师死者枕”^⑩,说明白银与制钱的比价已经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明政府规定“且定嘉靖钱七文洪武诸钱十文前代钱三十文当银一分”^⑪。此后,嘉靖时期税收三两以下收钱,民间一钱白银以下止许用钱,“时钱八文折银一分”^⑫。隆庆六年(1572 年),“覆准将嘉靖隆庆万历制钱遵照前奉,钦依每金背八文准银一分火漆边各十文准银一分,洪武等项与前代旧钱各十二分准银一分相兼行使”^⑬。到万历四年(1576 年),“户部言钱之轻重不常,轻则敛,重则散,初铸时金背十文直银一分,今万历金背五文嘉靖金背四文各直银一分”^⑭。而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南京银一分钱十文”^⑮。到崇祯年间(1628~1644 年),“崇祯元年以 55 文当银一钱”^⑯。至崇祯后期,“崇祯通宝,民间绝不行使”^⑰。从以上史料中,可以看出明代白银与铜钱的比价还是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的变动过程。为方便观察,特绘制比价变化图(见附图)。

从这张比价变化图上也可以看出,从明初到 1525 年左右,白银与铜钱比价一直非常平稳,而且略有下降趋势;从 1525 年左右,开始发生波动,到 1610 年左右,波动次数较频繁;从 1610 年左右到明朝灭亡时期,白银与铜钱比价一直走高,并且达到了明代时期的最高点。为何主币辅币之间比价会出现这样的变动,这种变动所带来的结果又是什么,我们



明代白银与铜钱比价变动图

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分析影响白银与铜钱比价变动的原因。

二、明代钱银比价变化的原因分析

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此外还体现一定的社会关系。白银和铜钱都是这种特殊商品，本身作为金属货币具有价值，那么二者的比价既由各自本身所蕴含的价值决定，同时也受到货币的供给与需求影响^①。从这点入手，得出银、钱比价变化有以下原因：

1、政府为追求钱息而大量铸钱，滥铸劣质铜钱是导致银钱比价变动的主要原因。

铜钱作为政府铸币，其本身具有价值，但是这种价值和金银这种硬通货不同，铜钱作为不足值货币，一般要比政府规定的价值要低，政府发行铸币，可以从中获取钱息，但是为了铸息而滥铸劣质铜钱也很容易妨碍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明代货币政策较为纷杂，尤其是铜钱的铸造和发行政策非常混乱且不连贯，《明史》中记载：“钱法朝议夕更，迄无成说”^②。仅在洪武年间，铸币政策反复不已，元年开始铸洪武通宝，颁布制钱，到八年就停止宝源局制钱，九年停止各省铸钱；然而，到洪武十年又恢复各省铸钱；二十六年再停各省铸钱^③，反复多次，“钱制”不稳定。但

由于明朝前期国力较强盛，加之白银未成为合法货币，所以对白银与铜钱比价的影响并不很大。但是到了嘉靖年间，朝廷不单增加铸币，还发国库中的新旧铜钱作为俸粮，大大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供给。同时，国家还片面追求通过铸币来获取营利钱息，“给事中殷正茂言，两京铜价大高，铸钱得不偿费。宜采云南铜，运至岳州鼓铸，费工本银三十九万，可得钱六万五千万文，直银九十三万两，足以少佐国家之急”^④。可以看出，通过铸币，政府能够赢取利润。最初铸钱，钱千文重八斤八两，到天启二年，仅四斤八两，而这所谓的营利毫无疑问要转嫁给社会经济。明朝政府这种没有准备金制度的滥发铸币只能导致白银与铜钱比价的上升，而造成铜钱流通的混乱。到了明朝后期，由于铜矿匮乏，为了“钱息”，明政府开始从开采铜矿铸币转为买铜来铸币。《明史》中记载：“崇祯元年……宝泉局铜本四十万两，旧例钱成还本太仓，次年再借，至是令永作铸本。三年，御史铎京言：铸钱开局，本通行天下，今乃苦於无息，旋开旋罢，自南北两局外，仅存湖广、陕西、四川、云南及宣、密二镇。而所铸之息，不尽归朝廷，复苦无铸本，盖以买铜而非采铜也。”^⑤由此可以看出，明代政府将铸币看作创造社会生产价值的营利方法而非一项货币政策。在明代政府大肆发行铸币的同时，在铸币质量上

的控制也非常之松弛,虽然政府一再强调铸币质量,万历时“采工部言,以五铢钱为准,用四火黄铜铸金背,二火黄铜铸火漆,粗恶者罪之”²³,但是在政府追求钱息,下层负责铸币官员又为了自身利益,导致铸币质量非常差。《明史》记载“嘉靖四十三年,宝源局匠人役人等侵料减工致轻小,恶不堪行使”,经济学著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在这样的货币政策下得到显现,人们纷纷把优质铜钱用于储藏保值,市场上劣质铜钱流通越来越多,从而白银与铜钱的比价波动越来越大。

2. 私铸盛行是银钱比价上升的重要原因。

伴随着政府铸币的发行是私铸的盛行,私钱数量不菲,洪武时期,民间交易杂以私铸²⁴,且与国家发行的铸币相竞争,使政府钱法不通²⁵。《明史》载嘉靖时,“民间竞相私铸嘉靖钱,与官钱并行焉”。私铸伪造一般质量很差,重量达不到国家标准,史籍描绘说“轻薄制小,触手可碎”²⁶,“甚则不用铜,而用铅、铁”²⁷。为解决铸币流通中出现的“钱法不通”和严重私铸现象,明朝政府从法律和经济上采取了相应措施,可是私铸的铜钱依然流入市场,并给白银与制钱比价带来冲击,和政府滥铸铜钱一样,铜钱本身价值不能得到保证,直到明朝灭亡,“是时每千值银不过一钱二分较之铜价且不及”²⁸,通货膨胀加速。

3. 白银供给量的变化也是影响银钱比价变化的重要因素

白银作为硬通货,币值稳定,信用良好,虽然也没有一律成色但相差较小²⁹,所以,它的供给量对于货币流通以及银钱比价变化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

首先,从采矿课银方面来看白银数量对银钱比价的影响。明朝初期政府不鼓励开采银矿,《明史》中记载“坑冶之课,金银、铜铁、铅汞、硃砂、青绿,而金银矿最为民害……土地所产,有时而穷。岁课成额,徵银无已”³⁰。这样看来,明朝初期统治者还是很有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的,所以此时的课银收入很少,大概只有75,070两³¹。在明初铸币数量质量也比较正常的情况下,白银与铜钱比价一直维持在比较合理的范围。可是白银的使用是经济规律的客观需要,随着社会白银的广泛使用,白银的大量开采是不可避免的。明太祖之后,太宗朝课银收入为4,934,898两,明仁宗朝为212,864两,宣宗朝课银收入2,308,058两³²,白银的开采量还是比较大的。这一段时间,明代经济也比较平稳,铸币发行也较稳定,白银的开采量较大,加之对外贸易流入的白银,而金属铜的开

采量则比较少,记载中称有时还需要进口日本铜,所以此时白银与铜钱比价稳中有降。到英宗时期,课银收入骤然减少,白银作为货币在商品流通领域中的使用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承认,银本位制也就此确立,此时白银的短缺虽然比较严重,但是明政府“钱制”方面还是比较稳定的,给白银与铜钱比价带来的波动并不是很大,如上文所述,比价还是停留在七百文兑一两白银。可是白银的短缺却给海外贸易打开了一扇门,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疏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到了明后期,课银收入开始明显下降,明后期为维持开采,虽矿砂银少,但还是尽力开采,酿成社会矛盾,银少而钱制混乱,铸币滥发私钱流通,明朝后期白银与铜钱比价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到明末出现了五千五百文兑一两白银的局面。

其次,从对外贸易方面来看白银与铜钱比价变动。明初由于海禁,官贡贸易作为当时贸易的主要形式一直持续到隆庆年间,解除海禁之后,明代对外贸易出现了兴盛一时的情况,明朝政府国际收支一直处于入超状况,对外贸易给明代社会注入了大量的白银。万明先生认为从美洲输入的白银通过马尼拉一线的1570年到1644年约有7620吨,欧洲输入的大约5000吨³³,这样大量的白银输入给明代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也给明代货币体系带来了冲击,“外国银元的流入,在中国的货币文化上引起了一次大变革”³⁴。白银与铜钱比价的上下波动恰巧证明了对外贸易白银输入的作用,在对外贸易入超巨大的情况下,白银的输入有利于稳定银钱比价。与此同时,海外流入的白银加大了中国白银货币供给,满足了明朝经济社会的货币需求,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保持了明朝社会的主币与辅币的比值稳定。不过,这样也使明朝时期货币供给过多的依赖于海外输入的白银,导致在明朝后期,当对外贸易额减少,白银输入的减退,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白银与铜钱比价骤升,加快了明王朝的灭亡。

4. 明代社会生产力以及劳动生产率发展的落后,是造成白银与铜钱比价变动的根本原因

明代发行了大明宝钞,作为信用货币,却没有任何准备金制度³⁵。作为货币政策的工具,准备金制度可以通过调整准备金比例来改变货币乘数,从而控制社会货币的信用创造能力,并且控制货币供应量。但是明朝却滥发纸币,到英宗时期国家政府已经无法控制货币体系的选择而遵从经济规律选择了银本

位制度,流传了几千年的贱金属铸币被贵金属银取代,这一现象表现了明政府干预经济能力的下降,也表现出封建制度下的政府对于萌芽式的商品经济的控制力减弱,反映了当时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货币制度的转变也可以看出资本主义萌芽的特征已经开始在明代社会出现。但是在确立了银本位制度之后,白银与铜钱之间的比价却开始了耐人寻味的变动,银钱比价在经历了一番起伏之后,逐渐走向高位,白银所能兑换的铜币越来越多,最后明代崇祯通宝在民间不能流通,明代政府的货币体系正式瓦解。白银在明代作为可自由兑换、流通的国际通用货币,在对外贸易中使用,铜钱则仅作为在国内使用之货币,基本上不参加对外贸易(也有例外,例如永乐通宝,郑和下西洋时期就受到各国的欢迎)。那么如果通过货币的国际价值角度来看,白银作为一种当时国际贸易通行的货币,在各国可以自由兑换,它所代表的是世界平均劳动生产率所蕴含的价值,铜钱则代表明代中国平均劳动生产率所蕴含的价值,白银和铜钱的比价实际上就是世界劳动平均生产率与中国劳动生产率之比。从这点上来看,明代白银与铜钱比价的走势恰恰代表了明代中国劳动生产率发展与世界劳动生产率发展的相互关系。劳动生产率是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可以说,正是明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迟缓,导致其社会经济迟滞,最后造成明代本国货币铜钱与国际货币白银之间比价的变动。到明代末期,银钱比价变动更为剧烈,能兑换到白银的铜钱数量增大,而此时的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则是生产力快速发展,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白银也不能满足日益壮大的货币流通需要,各国开始走向金本位制。对比明末之中国的白银能兑换到更多的铜钱,流通领域的通货膨胀没能动摇封建经济落后的经济体制,反而给商品经济带来了很大的阻碍,经济发展日益迟缓^①,白银本位制的货币体系没有过渡成为金本位制货币体系,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就此止步。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导致了白银与铜钱的比价的波动,同时,白银与铜钱比价的波动也影响了新型生产关系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前进,从而直接导致了明王朝的灭亡,也导致了中国开始落后于世界经济脚步。

三. 结 语

综上所述,明代白银与铜钱比价经历了一个较复杂的变动过程,从初期的平稳到后期的频繁波动,

这一变动源于政府片面地追求铸息、私铸钱币的盛行、开采银矿所得白银以及明朝对外贸易白银流入等因素的变化,同时与明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缓慢也有着重要联系。明朝白银和制钱的比价总体上符合经济规律,体现了各自的价值比关系,但明代银钱比价的变动给国家货币体系带来了较大的冲击,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这亦是导致明王朝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研究明代银钱的比价关系,既可以对明代的货币史有一深入认识,更可以对整个明代的政治、经济发展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注释:

①、④、⑦、⑬、⑭ 《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②、⑤、⑥、⑧、⑨、⑩、⑪、⑫、⑬、⑭ 张廷玉:《明史·食货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

③ 《孝宗弘治实录》,江苏国学图书馆影印明传抄本。

⑮ 《万历起居注》,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年。

⑯ 王甫:《呻吟实录》,古今说部丛书本。

⑰ 刘利平:《明清时期银钱比价初探》,《肇庆学院院报》,2003年第6期。

⑱、⑲、⑳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㉑ 周晖:《金陵琐事》,中国方志丛书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㉒ 徐学聚:《明朝典汇》。

㉓ 《明太祖实录》,中华书局,1977年。

㉔、㉕ 王玉祥:《明代“私钱”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

㉖ 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

㉗、㉘ 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钱法》,上海掌故丛书本。

㉙、㉚ 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新亚研究所,1972年。

㉛ 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

㉜ 任均尚:《明朝货币政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㉝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九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责任编辑:刘慧中)